

## 仲長統生平事蹟著述攷

王洲明 楊 霞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安徽省廣播電視大學教學處)

仲長統是東漢社會批判思潮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的政論散文指摘時弊，充滿了積極入世的儒家精神，而其《樂志文》、《樂志詩》又是道家逍遙之風的體現。因此，探討仲長統的思想觀點和文學創作具有一定的意義。鑒於仲長統作品保留下來的很少，而後人相關的著述也不多，這就造成了對同一問題有不同見解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對其生平事蹟著述進行一番攷索。

## 一、生平事蹟攷

## (一)關於生卒年

關於仲長統的生卒年份，主要有兩種觀點：

其一、認為其生於西元 179 年(漢靈帝光和二年)，而卒於西元 219 年(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持此觀點的論著有：《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1981 年)<sup>[1]</sup>；《中國歷史人物辭典》(1983 年)<sup>[2]</sup>；《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1993 年)<sup>[3]</sup>和《中國姓氏辭典》(1995 年)<sup>4</sup>。

其二、認為其生於西元 180 年(漢靈帝光和三年)，而卒於西元 220 年(魏文帝黃初元年)。持此觀點的論著有：《中國文學家大辭典》(1981 年)<sup>[5]</sup>；《中古文學系年》(1985 年)<sup>[6]</sup>；《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1993 年)<sup>[7]</sup>；《中國歷代年譜總錄》(1997 年)<sup>[8]</sup>和《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1999 年)<sup>[9]</sup>。

也有認為仲長統生於西元 179 年，卒於西元 220 年。

由上述論著尤其是這些論著的編撰出版年份來看，長期以來，關於仲長統的生卒年的認識，並沒有形成定論。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對仲長統卒年的理解。

《後漢書·仲長統列傳》：“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

繆襲《上〈昌言〉表》：“(統)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sup>[10]</sup>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延康元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

根據上述史料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西元 220 年的年號改了兩次，也就是說當年存有三個年號，它們分別是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漢桓帝延康元年、魏文帝黃初元年。仲長統究竟死於這一年的哪一月份，已無法攷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卒年當是西元 220 年。攷察有上述不同意見的原因，其中的一種認為仲長統卒於西元 219 年，很可能是錯誤認為“獻帝遜位之歲”發生在魏文帝建國的前一年，也即西元 219 年。而認定仲長統卒於 220 年者，對其生年的推算又有生於 179 年和 180 年兩種不同的意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這就涉及到“年四十一”是周歲還是虛歲的問題。若以“年四十一”為周歲向上推算，則生年在 179 年；若以“年四十一”為虛歲向上推算，則生年為 180 年。古人稱其年歲數通常皆稱虛歲，故仲長統當生於西元 180 年，而卒於西元 220 年。

## (二) 關於姓名

《後漢書·本傳》：“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

是複姓仲長、名統，擬或是姓仲而名長統？據攷：

其一、《全後漢文》載仲長統所作《答鄧義社主難》自稱為“統”；

其二、《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註引繆襲所上《昌言表》中有十一處稱“統”；

其三、《後漢書·本傳》全稱“統”，而不稱“長統”；

其四、後代諸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中都稱作“仲長子”。

據此，我們所要研究的東漢末期這位以著《昌言》而被史書記載的仲長統，當複姓仲長，名統，字公理。

## (三) 關於籍貫

《後漢書·本傳》記載仲長統為“山陽高平人”，也就是山陽郡高平縣人。而今人對“山陽高平”的現今方位有不同的看法。大多認為在山東，分別為滕州市、微山縣西北、金鄉西北四十里、鄒縣西南；個別觀點認為在今山西省高平縣。

首先可排除“山西省高平縣”的可能。根據《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sup>[11]</sup>：高平縣，北魏永安中以長平縣改名，治所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北齊天保元年移治今高平縣。

又根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sup>[12]</sup>中對“山陽郡”的兩條記載：(一)漢置。晉改為高平國。故治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二)晉置。隋廢。即今江蘇淮安縣治。既然仲長統為漢代“山陽高平人”，高平應屬山陽郡，故仲長統不可能是山西人。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sup>[13]</sup>東漢版圖上有“山陽高平”一地，位於南陽湖、昭陽湖、獨山湖和微山湖四大湖區的東岸，更具體的方位是在獨山湖的北岸。對照西漢地圖，高平其時為橐縣。

三國魏時，該地仍為山陽高平；西晉泰始元年，山陽郡改名為高平郡；隋開皇初廢。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辭典》<sup>[14]</sup>中的山東省地圖，獨山湖在今魯橋鎮、兩城鄉附近，距後者更近一些。該辭典中有對兩城鄉的介紹：地處微山縣西北部，南陽湖東岸，獨湖北岸。西漢為橐縣城，東漢、晉為高平侯國，南朝宋為高平郡高平縣治所。

所以，山陽高平的地理沿革(自西漢始)大致為：山陽郡橐縣、山陽郡高平縣、高平郡高平縣(不明確時段)、山東省微山縣兩城鄉。仲長統是今山東省濟寧市微山縣兩城鄉人。

## (四) 關於交友

### 1. 與常林

仲長統與常林在上黨時曾有過交往。《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註引繆襲《上(仲長)統(昌言)表》：“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其詳細交往見下述事蹟攷。

### 2. 與高幹

《後漢書·本傳》：並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並州叛，卒至於敗。並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可見，統預言了幹的覆滅，也成就了自己的名聲。

### 3. 與繆襲

繆襲(186—245)，字熙伯，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境)人，三國曹魏時文學家。建安中出仕，在御

史大夫府供職，歷事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朝，官至尚書、光祿勳。

繆襲為仲長統好友。《後漢書·仲長統列傳》：“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

繆襲《上（仲長）統〈昌言〉表》（《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裴松之註引），記敘仲長統生平，簡要生動，寫出了其個儻不群、敢於直言的性格。從《本傳》所記對仲長統的評價，以及《上〈昌言〉表》中對統的瞭解程度看，二人相知甚深。

#### 4. 與荀彧

荀彧（163—212），字文若，潁川潁陽即今河南許昌人。三國曹操謀士。建安元年，建議迎獻帝都許，使曹操取得有利政治形勢。不久，任尚書令。

荀彧與統當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且荀彧的進退出處對統的政治生活有直接影響。統在荀彧的舉薦下出任尚書郎；荀彧被曹操器重時，統得以入幕曹府；荀彧死，統即由曹操幕府“復還尚書郎”。（《後漢書·仲長統列傳》）

#### 5. 與曹操

統參曹操軍事一事在後代材料中只有寥寥幾筆提及<sup>[15]</sup>，詳情已不得而知。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的人才觀有異曲同工之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在其《舉賢勿拘品行令》中清楚地表達了他的任人唯才的用人思想，尤其是對“不忠不孝”者的任用，即“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sup>[16]</sup>。統在《昌言·損益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兩人的這種唯賢是舉、重才能甚於德行的人才觀，對儒家所提倡的並長期盛行的忠孝節義觀而言，是一種全新的挑戰。

#### 6. 與鄧義

統《答鄧義社主難》一文顯示出仲長統、鄧義、荀彧三人的關係。

鄧義為侍中（秦時始置，為丞相的屬官，掌管拾遺補缺、贊導、陪乘、出而負璽以及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伴隨在皇帝、丞相身邊；荀彧時為尚書令（秦時始置，為尚書臺首長，是直接對皇帝負責、掌管一切政令的首腦）；仲長統為尚書郎（尚書臺內負責起草文書的官員）。三人都是漢獻帝的官員。當時具體權力大小應是：尚書令、侍中、尚書郎。尚書郎直接歸屬尚書令。所以《答鄧義社主難》中有“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之語。（詳細辯難見後）

### （五）關於生平事蹟

東漢靈帝光和三年即西元180年，仲長統出生於其時的山陽郡高平縣，也就是今天的山東省濟寧市微山縣兩城鄉。

統當生長在中下層地主家庭，因為他少時“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漢書·本傳》），試想遭逢亂世且又是窮苦家庭出身的子弟，應該是沒有條件去讀書識字的。從現今保存下來的著作《昌言》來看，少時的統讀書誦經、研習經典，尤好《禮》、《易》。至於弱冠之年，統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涯。時間大約是漢獻帝建安四年，即西元199年。

歷史上的西元180年至199年，正值漢末亂世。其間帝位由漢靈帝劉宏（168—189年在位），過渡到漢朝末代皇帝獻帝劉協（190—220年在位）；年號幾經更改，由靈帝光和（178—184，共7年）、中平（184—189年，共6年），到獻帝初平（190—193年，共4年）、興平（194—195年，共2年）、建安（196—220年，共25年）。今天看來，這些年號多有反諷之意，因為在當時，所謂的“和”、“平”、

“安”已成為幻影。在西元 180 年至 199 年，也就是仲長統成長的這二十年裏，發生了許多大事，使東漢王朝的大廈開始傾覆。請看：

“光和(184 年)末，黃巾起。”起義波及了河南、河北、山東和其他多個省份。

“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未遂。

“是歲中平元年(189)也”，“會靈帝崩”，董卓廢新帝“而立獻帝”，“京都大亂”。

“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sup>[17]</sup>自此後，軍閥割據，外爭內訌此起彼伏。

建安四年(199)，董卓、呂布、袁術相繼死去，天子幾番遷都，曹操勢力膨脹壯大。

正是在這大動亂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仲長統，於二十歲時開始遊學於青、徐、並、冀四地。其地域主要分佈在今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河北、遼寧一帶，這是當時戰亂最頻繁地區。試想年輕的統在其間行走，目睹民生凋敝、戰火紛飛、“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sup>[18]</sup>的場景時會是怎樣的心情！

統始遊上黨(在今山西黎城縣南)，與常林為友。

常林，字伯槐，少時即有嘉名。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據前文，當在 190 年之後)，林因其叔父獲罪，而“避地上黨，耕種山阿”<sup>[19]</sup>。高幹召其為官，堅辭不受。後被並州刺史梁習舉薦成為“南和縣長”，治化有成，遷至太守、刺史，多為曹丕謀劃。魏建國，拜尚書，封侯，官至大司農，徙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壽終。時論以節操清峻。

據前述，統於 199 年遊上黨交接常林，而林規避於此近十年了。林比統年齡要大很多，對統也多有影響。繆襲《上統〈昌言〉表》記載：

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與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此間，統在州郡召喚下屢屢拒絕出仕。“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sup>[20]</sup>，遂作《樂志文》和《樂志詩》。

至於統是不是真的就過上了一段時間的“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樂志文》)的田園生活，我們不得而知。但文中他所慨歎的“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樂志文》)的這一點，他到底沒有做到。因為當漢獻帝的尚書令荀彧舉薦其為尚書郎的時候，他終於應召了。關於仲長統做尚書郎的年代沒有明確記載。司馬光認為是西元 206 年，即建安十一年。是年，高幹被誅，陳郡梁習任並州刺史，治理有方，並推薦“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為縣長，後皆顯名於世。”而“山陽仲長統”遊學並州，與高幹有過交往，對高幹的為人有所評論，並予以勸諫(見前引《後漢書·仲長統列傳》)。“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sup>[21]</sup>司馬光很可能就是根據上述資料而定 206 年統任尚書郎的。試想幹死，至統被舉薦，相隔時間不應很長。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系年》贊成並沿用了此種觀點：西元 206 年，統為尚書郎，並作《答鄧義社主難》一文。

大約在建安十三年即西元 208 年、統 29 歲之後的某一年，或者就在當年，“統參丞相軍事”(《本傳》)。因為是年也即“(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漢“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即曹操)為丞相”<sup>[22]</sup>，統在做了大約兩年多的尚書郎後開始參與曹操的軍事活動。

《後漢書·仲長統列傳》：統“後參丞相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以今日保留下來的殘存的約一萬五千字的《昌言》文字來看，仲長統或批判圖讖迷信，或批判社會風氣，或批判外戚宦官，或批判門閥制度，其鋒芒幾乎遍及社會現實的各個方面：有論治國安邦的、有論歷史史觀的、有論損益改革的，涉及到外戚宦官之亂、權力歸屬、德治法治、社會風俗、人性善醜，還有行氣成仙等內容，可謂包羅甚眾。統跟隨曹操後開始寫作

這些文章，為時應該不短。也有觀點稱統著《昌言》未竟而卒，繆襲續之。<sup>[23]</sup>尚無其他資料為佐證。

建安十七年(212)，薦舉仲長統的荀彧因反對曹操進爵國公，招致不滿，“以憂薨”<sup>[24]</sup>，或謂“飲藥而卒”<sup>[25]</sup>。

又據《本傳》記載：“統復還為郎”。關於統在曹操身邊效力多久又回到尚書郎的位子上，已無法考證到具體年月。從他的《昌言》可以看出他雖猛烈批判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但沒有想到要推翻漢家王朝，他同時也信奉“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的道理（《昌言·損益篇》）。荀彧認為曹操有改朝換代的野心而憂死或自殺，統可能也看到了這其中的曲折。最後統又回到了尚書郎的身份。年份可能在建安十七年(212)後也即荀彧死後的幾年裏。並且，極可能，統一直到死都還是漢家尚書郎。很巧合的是，在曹魏代漢的當年，西元220年，即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統卒，“年四十餘”（《本傳》）。他至死也沒有成為魏國子民。也正因為此，所以各朝代相關史書上都記載“《昌言》，漢尚書郎仲長統撰”。

在復為尚書郎到離世的幾年裏，統可能像《樂志文》中所期待的那樣過著“躑躅畦苑，遊戲平林”、“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的日子。然而他終歸是英年早逝，非但沒有“永保性命之期”，相反比一般人離去的要早。他的主要論著是《昌言》，此外還有詩和其他文章傳世，不過，在歷史的沉浮中，遠非本來之面目了。

## 二、著述攷

仲長統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的政論散文《昌言》指摘時弊，充滿了積極入世、治世的儒家精神；而其《樂志文》、《樂志詩》又是道家逍遙之風的體現；至於晚年，則要離經叛道、火燒百家，其“翱翔太清，縱意容冶”的情致又別有一番魏晉風度。而就其作品本身而言，內容翔實、感情充沛、氣勢澎湃、張揚大度是其基本特徵。後人曾評之“俊發”、“騰蹕”。

### (一)《昌言》

在荀彧的薦舉下，仲長統出任漢朝尚書郎，尚書郎是尚書令的屬官，幫助皇帝處理政事。可能又是因為荀彧的關係，當然，統自身也具備了相當的才能學識，不久，他開始參與到丞相曹操的軍事當中。《後漢書·本傳》載：“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在《說文解字》中，“昌”本義為“美言”，《尚書·大禹謨》曰“禹拜昌言”，《史記·夏本紀》正作“禹拜美言”。《後漢書·本傳》註曰：“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認為“昌言”即當理之言。另外，關於《大禹謨》，《孟子·公孫丑》趙岐註又作“禹拜讜言”（讜，《說文》：直言也）；而陸機在《文賦》中有“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之句，體現了懷才不遇、忠言逆耳的尷尬。由此看，《昌言》之題應該兼具美言、當言、忠言、直言多層含義。其中，“直言”與統的性格相一致，而《昌言》從內容上看也確實直言無忌。

關於《昌言》的篇目。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仲長統其人其事（包括《昌言》篇目）的最早記錄是繆襲的《上〈昌言〉表》，但它也是被轉載引用的，出現在裴松之為《三國志·魏書·劉劭傳》所作的註釋中。范曄撰寫《後漢書》與裴松之註《三國志》的年代相近，可以推斷兩者在當時都可以看到原版的《上〈昌言〉表》。<sup>[26]</sup>裴註直接引用了《上〈昌言〉表》，而《後漢書》則沒有標明，但從仲長統《本傳》的內容和文字上進行分析，可以斷定范書寫作時也參照了《上〈昌言〉表》。裴註《三國志》所引的《上〈昌言〉表》中記載《昌言》“凡二十四篇”；《後漢書》仲長統《本傳》記有“凡三十四篇”。從後代絕大部分史籍載錄《昌言》有三十四篇的情況來看，《後漢書》的記載更為可信。

關於《昌言》的流傳保存情況。《隋書·經籍志》載錄：“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舊唐書·

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均載錄：“昌言十卷”；宋代《崇文總目》稱：“仲長子昌言二卷”、“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隋唐書目十卷，今所存十五篇，分為三卷，餘皆亡。”南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無著錄記載；南宋《群書攷索》稱：《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宋史·藝文志》載：“昌言二卷”；《清史稿·藝文志》載：“《昌言》一卷”。由以上著錄可知，《昌言》在唐末五代的戰亂中散佚過半，其後因無人整理，連宋人所見之“十五篇”、“十六篇”也大多散佚了。至清代，只剩下卷。馬國翰、嚴可均則分別對《昌言》進行了整理。

綜上，《昌言》原書“十餘萬言”不斷散佚，如今可看到的總計不到二萬字，僅為原書的十之一二，並且分佈在不同的典籍和文章中。現簡單作一介紹：

[東晉]葛洪《抱朴子·至理》引用兩條；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仲長統列傳》：錄有《理亂篇》、《損益篇》、《法誠篇》；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摘錄四條；

[唐]魏徵《群書治要》(卷四十五)摘錄九條；

[唐]馬總《意林》(卷五)摘錄二十一條(其中十二條是其他著作所無)；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注》中有隻言片語。

[清]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將上述佚文輯為兩卷；<sup>[27]</sup> [清]嚴可均在《全後漢文》中輯為兩卷。<sup>[28]</sup>

後代有人為《昌言》某些篇章作註、點評，比如明人陸可教、李廷機在《昌言玄言評苑》中，錄《理紀》(當為“理亂”)、《損益》二篇文字，雙行夾註，並加圈點、眉批，雜引其他各家說。<sup>[29]</sup> 明代歸有光、文震孟《費山子評點》作了大致相同的工作，並附有幾家評論(在《諸子匯函》內)。

按歸有光的說法，費山子即是仲長統，也就是仲長子。後世多習慣稱後者(這點當無疑義。如：《隋書》、新舊《唐書》、《崇文總目》等書籍都記作“仲長子”)，前者則鮮為人道。歸有光《諸子匯函》有載：

費山子，姓仲長名統，東漢安帝時人。清忠亮節於朝野。憫時政之多乖，憤風俗之頹敗，作《昌言》。未竟而亡。天下惜之。居費堂嶺，故曰費山子。

歸有光筆下的仲長統是東漢安帝時人，而漢安帝在位時間為西元 107 年至 125 年。所有證據都表明統當是東漢末年靈帝、獻帝時人，因此，歸有光這種提法有誤。同樣，歸認為統作《昌言》“未竟而亡”也缺乏證據。

另外，歸有光稱統為費山子的原因是因為統“居費堂嶺，故曰費山子”。

費堂嶺，在今天的山東省境內，又名費山。“費”古稱學校，表明費山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山。相傳春秋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鬼谷子曾隱居此山，留有鬼谷洞，其弟子孫臏、龐涓、蘇秦、張儀名滿天下。東漢時期儒學家鄭康成曾教授門徒于此山。至宋范仲淹在此讀書，後一舉成名。<sup>[30]</sup>

至於仲長統是否在費堂嶺著書，除了歸有光有記載之外，並不見於其他書籍。

而後人有評論歸有光在《諸子匯函》中將“屈原謂之玉虛子，宋玉謂之鹿谿子……仲長統謂之費山子，王符謂之回中子……”，為“改易名目，詭怪不經”之舉，“皆荒唐鄙誕莫可究詰”也。<sup>[31]</sup> 故歸氏謂仲長統“居費堂嶺，故曰費山子”之說，很可能是獵奇之言，不可為據。

## (二)《樂志文》

《樂志文》為統年輕遊上黨之時所作(說見前)。展現出其俯仰人間、放浪形骸、逍遙一世的人生境界。《後漢書·本傳》有載錄。胡維新《兩京遺篇》題為《樂志論》。

另據《文選》卷十六【志下】潘岳《閒居賦》中“環林縈映，圓海回淵”句下註云：仲長子《昌言》曰“溝池自週，竹木自環”，與現存《樂志文》中“溝池環匝，竹木週佈”極相似。由此推知，《樂志文》很可

能是《昌言》三十四篇之一。

### (三)《樂志詩》

《樂志詩》二首多遺世和憤憤不平之語，所謂“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人事可遺，何為局促”；所謂“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以此，推斷詩作於荀彧憂憤而死後，統從參曹操軍事任上“復還尚書郎”的一段時期，《樂志詩》所表現的感情和情緒，與《昌言》所流露的感情和情緒，非常接近。

《樂志詩》或稱《顯志詩》、《見志詩》。《後漢書·本傳》有載錄。

### (四)《答鄧義社主難》

《後漢書·祭祀志》註中錄有仲長統《答侍中鄧義社主難》一文。這是一場在仲長統（時為尚書郎）與鄧義（時為侍中<sup>[32]</sup>）之間展開的關於“社所祭者何神”的爭論。

此話題爭論，漢諸儒多有辯難。歷史上較有名的是在鄭眾<sup>[33]</sup>（鄭司農）與賈逵、馬融、許慎、王肅<sup>[34]</sup>之間進行的。（按：前四人早於仲長統，肅較統晚。）

鄭司農註《周禮》，他認為社祭土地神，句龍為配神；賈逵等人認為句龍即是社神。前者依據《孝經》；後者依據《古文左氏》。辯論的詳細內容可參看《周禮正義》（孫詒讓著）卷三十三《春官·大司馬》篇。

無疑，仲長統與鄧義之爭也是這一論戰中的一幕。統站在鄭司農一方，他贊成社為土神。義贊成社祭句龍，即“句龍即是社主”。雙方都引經據典，而對《周禮》與《禮記》中的文字又作各自的解釋。論戰過程：義“難”與統“答”，共三個回合。如第一回合：

鄧義以《禮記·郊特牲》中“社祭土而主陰氣”的觀點為立足點，指出句龍是“土行之官”，主陰。由此得出句龍即為社主的結論。仲長統亦用《禮記》原文進行反駁，他指出“地載萬物”的這一“地利”所在，說明了土地為百姓所親和與祭祀的原因。如此等等。所祭“社主”為何的爭論，為東漢經學論爭中的一個插曲，不過，也可看出有“狂生”之稱的仲長統對經書的熟稔，證明其的確“少好學，博涉書記，膽于文辭”。

與這次論爭相關的一件事，是仲長統對《周禮》與《禮記》的關係，談了自己的看法，為治經學史者所重視。

《禮記義疏》（清乾隆十三年敕撰）卷首綱領二，論及本經義例與讀經方法，有論：“仲氏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

《學術叢刊》<sup>[35]</sup>第一卷第一期中有吳康<sup>[36]</sup>撰寫的《仲長統論禮經傳——山中雜記之一》一篇。該文對《禮記義疏》中“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為仲長統所說，提出質疑並進行了攷證。具體攷證過程可參看吳康先生原文。結論是：“周禮之經，禮記之傳”正是出自《答鄧義社主難》中“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一句，並且統語只止於此，以下“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當是後人附會之舉。

### (五)關於對《史記》、《漢書》的評論

從殘存下來的資料來看，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仲長統曾對《史記》、《漢書》有細緻研究並有深刻見解的結論。

資料一：唐人李善《文選註》卷四十六《王文憲集序》有註：

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資料二：唐人司馬貞在註解《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中東方朔的事蹟時，留下一段“索隱”：

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

資料三：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四《史傳》篇：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辯之究矣。

（仲長統字公理）

在第一則材料中，仲長統將司馬遷（字子長）和班固定位為“述作之士”。孔子《論語·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西漢揚雄就其中的“述”和“作”作了非常到位的解釋。他認為：“其事則述，其書則作”<sup>[37]</sup>。“事”即“是，實”，指事實的本義；“書，心畫也”，意思是指個人對自己心靈知識的表達。因此，“述而不作”即是客觀的記敘事實，不摻雜個人的觀點。在仲長統看來，司馬遷和班固不僅用文字描述了歷史，同時也在書中滲透了個人的思想和感情，是“述作之士”。當然，在這裏我們尚不能判斷統對這種且述且作的方式持何種態度，但從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相信統正是在潛心鑽研兩部史書的基礎上才得出了這一結論的。

據資料二，仲長統認為司馬遷作《滑稽列傳》，寫了淳于髡、優孟、優旃的事蹟，沒有涉及到東方朔，沒有記載朔的行狀，並認為這種做法甚為不妥。

司馬遷對“滑稽”評價如下：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盾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司馬遷對上述三人“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sup>[38]</sup>的做法表現出褒揚的態度。統研讀《史記》，對遷“不稱東方朔”提出異議。他認為朔當入“滑稽之流”，因為朔同樣有著“不亦偉哉”的品行與事蹟。而遷未寫朔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可以肯定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在於：遷生於西元前145年，卒於前74年；朔生於西元前154年，卒於前93年。兩者大約生活在同一時期，因此，朔雖較遷先離世近二十年，但到底，蓋棺一時還難以形成定論。

今天我們對朔已經有了較為公允的評價：朔能言善辯，言詞流淌無滯礙，比如著《答客難》，談諧多智，而又文理清晰，辯證有力。這一特點符合“滑稽”的定義。但是，朔關心國事、關注民生，班固《漢書》中記載了朔“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的事蹟。朔較時人相比，還有著更清晰的頭腦、更通達的人生理念和更釋然的處世方式。他的朝隱，他的誠子詩，他臨終前的“善言”，都使得朔的人品、學識絕非淳于髡、優孟、優旃等“滑稽”之人可與之相提並論。正如司馬貞所言：“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sup>[39]</sup>。

但是，將仲長統和東方朔為人處事、性格特點作分析比較，仲長統為東方朔鳴不平，又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的性格不同，統是“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而朔相對柔和、迂曲。他們的處事方式不同，統是奮發有為，敢於直言；而朔能言善辯，以“滑稽”智謀取勝。但他們也有相同之處，都有濟世蒼生的情懷，都一度伴隨當時最高統治者左右，更重要的他們都憤世嫉俗、懷才不遇、鬱鬱不得志。仲長統為東方朔鳴不平，其實也正是為自己鳴不平。

據資料三，劉勰認為班固對“司馬遷之辭”有很高的領悟，並高度讚譽了《漢書》中《十志》的完備豐富、贊序章節的弘大富麗，認為《漢書》行文溫文爾雅、文質彬彬，頗多古史遺韻。同時，劉勰還轉述了仲長統對《漢書》寫作進行“辯之究”之後的評論：一是有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功績；二是有拋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三是接受賄賂而編寫史書的錯誤。仲長統對《漢書》特徵的評論固然是很有道理的，其所謂“遺親攘美”、“征賄鬻筆”的指責，也引起了後人的注意。傅玄的《傅子》中說：“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司馬遷也。”（《全晉文》

卷十五)《史通·曲筆》：“班固受金而始書。”仲長統對《史記》和《漢書》的評論，很可能都是《昌言》中的內容，劉勰作《文心雕龍》時還能看到。

#### (六)十六字小詩

仲長統有一首鮮為人知的十六字的小詩。全詩如下：

春雲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此詩見於唐朝徐堅《初學記》卷一《天部》篇中“風駟雲車”下引文，其他典籍尚無見記載。詩中大膽運用修辭手法，給春天裏的雲、秋天裏的風以“馬”和“駟”的形態，同時又賦予它們以人的性格與感情。馬、車(即春雲、秋風)不因駕馭者的阻止或催促而放慢或加快步伐，表現了對不受他人驅使，不因外力改變自己的堅韌品質的嚮往與推崇。然而，該詩在向我們展示一幅悠然自得的畫面的同時，也透露了這樣的訊息：此景祇應天上有。祇有在春和景明或秋高氣爽的日子裏，祇有天上飄忽的雲彩和空氣裏流動的風才是此種安然祥和景象中的主角。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仲長統在作此詩時既傾羨又悵惘的心情。

仲長統的這種情態在他的兩首《樂志詩》中有所轉變。尤其《樂志詩》一中“乘雲無轡，騎風無足”一句，與前文的雲馬、風駟一脈相承且更進一步：抒情主人公已突破了自身的局限，乘雲騎風縱意於天地之間。體現出統在作《樂志詩》時更加自由的精神境界。該十六字小詩與《樂志詩》相比照，透露出仲長統思想感情發展的脈絡。

#### (七)《尹文子》

宋代王應麟在《玉海》中記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詮次為上下二篇。明代梅鼎祚在《東漢文紀》中記載：《尹文子序》，漢山陽仲長氏撰定。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十七仲長統篇末尾亦載有《尹文子序》(據《尹文子道藏本》)：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襲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上引所謂《尹文子序》是否為仲長統所作，值得懷疑。其疑點有二：

上文中提到的“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的“黃初”為魏文帝曹丕的年號，黃初共七年(220—226)，其末年當為205或206年，而其時統已作古(統卒於220年)。

其二、同樣為明代人的歸有光在其《諸子匯函》中有兩處文字述及《尹文子》，一次為《尹文子》所作序言，曰：

尹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公孫龍。公孫龍稱之。學本黃、老，大較刑名家也。

一次在《諸子匯函》之《談藪》篇中，曰：

仲長統曰：尹文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而劉向亦以其學本黃、老。余見而輒轉玩之，有由也。

可以發現，該二段文字與所謂《尹文子序》首句雷同，大體意思也一致。但歸有光並沒述及統曾作有《尹文子序》。聯繫宋人王應麟的記載，仲長統對《尹文子》做過整理工作，對其內容也有評論，如“多所彌綸莊子”等，但是否作過《序言》尚有待新材料的發現。

(八)《兗州山陽先賢傳》

該書已經失傳。關於作者問題後人有不同看法。

《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兗州先賢傳》一卷。並未註明是仲長統所撰。

《舊唐書·經籍志》卷四十六：《兗州山陽先賢贊》一卷，仲長統撰。

《新唐書·藝文志》卷六十四：仲長統《山陽先賢傳》一卷。

清代章宗源根據唐代《元和姓纂》中“居高平晉太宰長仲穀著《山陽先賢傳》”，認為仲長統並非《兗州山陽先賢傳》的作者。

正如姚振宗在《後漢·藝文志》卷二中所分析的那樣：“按郡國傳記之書，大抵多後人以次註續，不止一家。”所以這部傳贊很可能出自多人之手。<sup>[40]</sup>

(九)《論散齋可宴樂》

唐代杜佑《通典·樂典·樂七》(卷一百四十七)中《散齋不廢樂議》篇記有：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此論今已失傳。從《散齋不廢樂議》推測其大致內容：關於在齋日(致齋、散齋<sup>[41]</sup>)逢“嘉慶之事”可否宴樂這一主題進行討論或辯論。尚書令荀彧引經據典加以解釋，最後得出“散齋宜從得會宴樂”的結論，贊成宴樂。統作《論散齋可宴樂》的背景可能與《答侍中鄧義社主難》一文相似，都是與荀彧有關，都是奉命而為。總之他的觀點與荀彧一致，即散齋之時可以宴樂。

【附】《全後漢文》未收入之仲長統作品遺文：

1.《論散齋可宴樂》

《通典·樂七》《散齋不廢樂議》：“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

2.“繩墨得拼彈。”

《說文通訓定聲》(惜陰軒叢書，咸豐刊本)第17冊“乾部第十四下”，“彈”字註釋：《衆經音義》引仲長統《昌言》云：“繩墨得拼彈。”

3.“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文選》卷五十三【論三】李康《運命論》：“文章之貴，棄于漢祖。”李善註：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4.“潔若清冰，嚴若秋霜。”

《文選》卷三十一【雜擬下】袁陽源《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五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李善註：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

5.“精核是非，議之嘉也。”

《文選》卷十八【音樂下】馬融《長笛賦並序》：“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李善註：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嘉也。”

6.“遷為《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唐司馬貞《索隱》：“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

7.“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李衛公外集》(唐李德裕)卷三《朋黨論》：“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

8.“才智者，亦奸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李衛公外集》(唐李德裕)卷三《朋黨論》：“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奸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

9. “百司皆宜執之。”

蕭子顯《南齊書·輿服志》：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

10. “春雲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徐堅《初學記》卷一《天部》：“風駟雲車”下引：仲長統詩曰“春雲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註釋：

[1]《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吳海林 李延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吳海林 李延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嚴靈峰（臺灣），中華書局 1993 年版。

[4]《中國姓氏辭典》，陳明遠 汪宗虎主編，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5]《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譚正璧編，上海書店 1981 年版。

[6]《中古文學系年》，陸侃如，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 年版。

[7]《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劉文英，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8]《中國歷代年譜總錄》，楊殿編，北圖出版社 1997 年版。

[9]《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張揮之 沈起煒 劉德重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10]《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註引。

[11]《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魏嵩山主編，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12]《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臧勵和等編，商務印書館 1931 年初版 1982 年重印。

[13]《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地圖出版社 1987 年版。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辭典》，商務印書館 1994 年版。

[15]《後漢書》仲長統《本傳》與《資治通鑒》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中提及。

[16]《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17]以上引文皆出自《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18]曹操《蒿裏行》。

[19]參見《三國志》常林《本傳》。

[20]《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列傳》。

[21]參看《資治通鑒》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

[22]《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23]《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抱朴子》：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

[24]《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25]《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註引[東晉]孫盛《魏氏春秋》。

[26]裴松之(372—451)，南朝宋人。范曄(398—445)，南朝宋人。

[27]仲長統《昌言》兩卷，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200 冊)。[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儒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

[28][清]嚴可均：《全後漢文》，商務印書館 1999 年版。

[29][明]光裕堂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30]魏嵩山：《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3 頁。

[31][明]歸有光：《諸子匯函》卷二十六末尾題言。

[32]侍中：東漢時皆博學高德之士，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乘笏陪見，為人主親信之官。

[33]鄭眾(? ~83)，東漢經學家。字仲師。開封人。曾任大司農，世稱鄭司農，以別於宦官鄭眾。傳其父鄭興《左傳》之學，兼通《易》、《詩》。世稱鄭興父子為“先鄭”，而稱鄭玄為“後鄭”。著作已佚，清馬國翰輯有《周禮鄭司農(眾)解詁》6卷，《鄭眾春秋牒例章句》1卷。

[34]賈逵(30—101)，東漢經學家、天文學家。字景伯。治古文經學。許慎(58—147)，賈逵弟子，著有《說文解字》。馬融(79—166)，東漢初大儒。字季長。王肅(195—256)，馬融弟子，撰《聖證論》。

[35]《學術叢刊》：中華文化學院出版社委員會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出版，即1947年6月。

[36]吳康(1897—1976)，字敬軒。哲學家。其時為《學術叢刊》主編。著有《周易大綱》、《老莊哲學》等書。曾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院長一職。

[37]揚雄《法言·問神》。

[38]《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

[39]《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

[40]關於《兗州山陽先賢傳》是否為仲長統所作，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有分析，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具體可參見章宗源(1752—1800)：《隋書·經籍志攷證》卷十三，載《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022頁；姚振宗(1842—1906)：《後漢書·藝文志》卷二，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307頁；[唐]林寶：《元和姓纂》，原本久佚，今本十八卷，從《永樂大典》輯出，分類攷證唐代各姓氏的來源及其旁支世系。

[41]關於致齋、散齋，《禮記·祭義第二十四》：“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又《禮記·祭統第二十五》：“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詳見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分別在第799頁、830頁。

#### 參攷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三家會註本)，中華書局1982年版。

[漢]班固：《漢書》(顏師古集註本)，中華書局1962年版。

[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99年12月第17次印刷。

[南朝宋]范曄等：《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

[南朝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文選註》，《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9冊。

[南朝梁]劉勰 王運熙譯註：《文心雕龍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版。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明]歸有光：《諸子匯函》，[明]天啟六年(1626年)序刊本。

[明]于慎行纂修：《兗州府志》(五十二卷)，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

[清]嚴可均校輯：《全後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辛冠潔：《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1982年版。

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嚴靈峰(臺灣)：《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版。